

嘉靖《定海县志》的编纂与价值*

李贤强 欧阳琳浩

提 要：嘉靖《定海县志》是致仕的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在浙江倭患平息以后所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张时彻的个人经历及人际关系对嘉靖《定海县志》的编纂旨趣和取裁影响很大。除此之外，张时彻早先编纂的嘉靖《宁波府志》也成为嘉靖《定海县志》模仿的范本。尽管嘉靖《定海县志》对府志沿袭很多，但张时彻也作了很多改动，这些改动使得《定海县志》更加完善。嘉靖《定海县志》不仅保存了很多现已散佚的时人作品，而且相关记载可以更新我们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总体来看，它是一部质量较佳的志书。

关键词：张时彻 定海县志 宁波府志 倭寇

方志于春秋战国时期萌芽，宋元时期定型、发展，历史非常悠久。明朝踵继前代修志的传统，大力提倡编纂方志。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方志理论渐趋成熟，各地方编修的地方志书日益增多。^①整个明代各地修志多达3470种，其中浙江地区有348种，冠绝各省。^②仅嘉靖朝的浙江地区，就有65种之多。^③这说明此期间浙江地区有一个修志的小高潮，张时彻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编纂的《定海县志》正是这种修志风气影响下的成果。

众所周知，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四十五年正是“嘉靖大倭寇”肆虐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罹祸甚巨，其中又“浙江为最”^④。尽管倭寇在浙江活动的时间较长，但到了嘉靖四十年已经基本平息。^⑤嘉靖四十二年正是浙江倭患甫平之时，这一时期浙江地区的方志是如何编纂的，它们又是如何体现时代特征的，这些问题学界尚未垂注。研究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方志，对于我们了解时代背景、个人对方志编纂的影响，以及推进海防史的研究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张时彻与嘉靖《定海县志》的编纂

张时彻（1500—1577），字维静，号东沙，又号九一，浙江宁波鄞县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官南京膳部主事、江西按察副使，提督学政、山东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江西巡抚、南京刑部侍郎、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张时彻著述颇丰，著有《芝园定集》51卷、《芝园别集》11卷、《芝园外集》24卷、《善行录》8卷、《老子解》1卷、《摄生众妙方》11卷、《急救良方》2卷，编纂有《四明风雅》4卷、《明文范》66卷、嘉靖《宁波府志》42卷、《天池寺集》9卷、《四明槎湖张氏族谱》1卷等。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16—17世纪环南海地缘战略演变与我国海防研究”（项目编号：15YJA770007）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刘光禄：《中国方志学概要》，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第33—34页。

② 参见巴兆祥：《论明代方志的数量和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4期。

③ 参见林平、张纪亮：《明代方志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2—169页。

④ 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9《宁台温之捷》，中华书局，2007年，第628页。

⑤ 参见范中义、全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中华书局，2004年，第141—146页。

嘉靖《定海县志》由定海知县何愈倡修、张时彻主纂。早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愈就积极搜罗旧志，希望可以作为参考来施政，“庚申（笔者注：1560年）之冬，愈承乏定邑……已而，寻绎旧志，将范往献，以昭厝理，无徒懵懵乎”^①。可惜的是，何愈希望凭借旧志来了解定海的意愿落空了。定海县在何愈修志前共编纂过县志2部，其中明初、正德各一部。^②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沿革建置、户口人数、土地赋税、官宦人物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很难有裨于时。而且旧志有很多问题，“乃其志，则口与地而海区弗逮，奚征防御。志疆域而古濠弗理，奚溯河源。纪宦迹而吏昌国者弗录，奚存有司。黄公、任奕踵讹弗删，丰稷、黄震传疑弗辨。事有脱略，文或繁芜，美刺相眩，名实失伦，苟若而可，将何以免于蹢躅乎”^③。正是因为旧志的不足为鉴，何愈打算编修新的县志。

嘉靖四十二年，何愈在公务闲暇之余，决意编志。“何君为定海之二年，政纪即叙，斑黎悦康，吏无骫度，野无伏奸，益图其旷阙而兴起之。谋于众曰：‘自余之始政也，土疆弗之察也，版纬弗之明也，役敛弗之经也，文献弗之稽也，贸贸而为之，皇皇而求之。’”^④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何愈决定延请张时彻修志。

张时彻主纂的嘉靖《定海县志》深深打上了他自己的烙印。通观全志，总共有其6篇诗文收入其中，是作品被收入数量最多的作者。这些诗文主要集中在卷5《疆域志》和卷6《经制志》，既有对风景名胜的描述，也有对历史人物的讴歌，充分体现了张时彻出众的文学才能。不仅如此，嘉靖《定海县志》有非常鲜明的情感倾向，从它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张时彻对倭寇的痛恨。“倭寇”“倭贼”“倭奴”等蔑视之词屡屡出现，多达60次。^⑤除此之外，他竭力颂扬抗倭的胡宗宪、卢镗、俞大猷、谭纶等人，在介绍他们的生祠后都附有大篇幅的纪传。^⑥如果考虑到嘉靖《定海县志》没有《艺文志》，这些纪传就显得特别重要。它们弥补了方志的缺陷，避免了定海无艺文的尴尬。其实，张时彻对倭寇的这种态度，早在他编纂的嘉靖《宁波府志》中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嘉靖《宁波府志》作为宁波府在明代的第一部府志，张时彻对当时的日本用了将近160次蔑称。如此看来，嘉靖《定海县志》不过是承继了他的旧有风格而已。

张时彻在嘉靖《定海县志》里面对倭寇的态度除了与强烈的家国情怀有关，也与他的独特经历和人际关系有关。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股只有六七十人的倭寇在江浙一带“经行数千里，杀戮及战伤无虑四五千人。凡杀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入二县”，甚至一度进攻南京城，“历八十余日始灭”^⑦。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张时彻束手无策，紧闭城门，任由倭寇肆虐。事后，张时彻作为此次事件的负责人受到南京给事中朱文汉、御史侯东莱、刑科给事中丘

① 嘉靖《定海县志》卷首《重修定海县志后序》，“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0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② 参见林平、张纪亮：《明代方志考》，第159页。

③ 嘉靖《定海县志》卷首《重修定海县志后序》，第13—14页。

④ 嘉靖《定海县志》卷首《定海县志叙》，第5页。

⑤ 参见刘晓东认为“倭国”“倭人”“倭夷”等词并非蔑视日本之词，是“基于传统华夷观念下的词汇”。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对这几个词在嘉靖《定海县志》出现的次数不予统计。参见刘晓东：《明代官方语境中的“倭寇”与“日本”——以〈明实录〉中的相关词汇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⑥ 参见嘉靖《定海县志》卷6《城隍》，第217—228页；卷9《坛庙》，第378—392页。

⑦ 《明世宗实录》卷425，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壬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红格本”，第7364页。

檇等人的猛烈弹劾：“盖其才乃小人之才，只足以为恶，而不足以济时。”^①张时彻因此被勒令出仕。或是出于自责，张时彻还曾专门为在这次事件中阵亡的指挥朱襄、蒋升作有祭文。^②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事件对张时彻的冲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其被免职数年之后，其所编嘉靖《宁波府志》、嘉靖《定海县志》仍然充斥着痛恨倭寇的情绪。

张时彻和他颂扬的抗倭官员之间的情谊也是影响嘉靖《定海县志》感情取向的重要因素。张时彻和总督胡宗宪相交甚好，两人往来频繁。胡宗宪短短数年就从巡按御史升为兵部尚书，被沈德符视为“暴贵”^③。他的几次高升张时彻几乎都作有贺文，^④张几乎扮演着徐渭一样的角色。^⑤不仅如此，胡宗宪指挥的战役取胜后，张时彻也同样作《赠右都御史总督默林胡公平夷叙》，以歌颂他的战功。^⑥嘉靖《定海县志》编纂于嘉靖四十二年，胡宗宪已于前年免职。很多人惧怕受胡宗宪的牵连，纷纷撇清关系。然而，张时彻在嘉靖《定海县志》依然收录自己所作《平夷碑》^⑦，继续颂扬胡宗宪的功绩。

武将卢镗和俞大猷为浙江地区的抗倭作出了重要贡献，张时彻和他们也有旧谊。卢镗曾随抗倭名将朱纨整顿福建海防，立下赫赫战功。随着朱纨被弹劾后自杀身亡，卢镗也获罪入狱。在严重的倭患面前，张时彻重新起用了卢镗，“会壬子癸丑，海上寇复大起，余叨二本兵，言北山故有奇节，出诸圜棘而用之”^⑧。张时彻同样也对俞大猷有知遇之恩，“乃壬子之岁，倭夷鼓众深入，大掠内地，破寨攻城殆无虚日，至黄岩之变极矣……余乃力举俞君可任两浙”^⑨。从张时彻的文集里收录的《送总兵都督北山卢公序》以及《贺总兵虚江俞公晋都督同知叙》《与俞大猷参将》等文来看，^⑩张时彻和他们的关系应该很好。

张时彻除了与这些抗倭官员交情较深，还和为他们写纪传的作者关系很好。如田汝成，嘉靖《定海县志》收录了他为卢镗写的《卢镗战功记》。张时彻曾送别田汝成，曾作诗：“生与君同域，仕与君同时。空余大马龄，不及瑚琏姿。在公闻广誉，退食瞻光仪。岂伊恋朋比，好爵心自靡。念子远徂征，奄忽成睽违。临歧长太息，握手泪如滋。中馈岂不厌，使我怒如饥。”^⑪从“握手泪如滋”的离别之情来看，他和田汝成的关系应该非常好。需要提及的是，同样参与编纂嘉靖《定海县志》的李贤曾是卢镗的幕客，“学能诗文，兼精皇极六壬诸数，总兵卢镗尝延置幕府”^⑫。我们相信，这样的关系也会影响到张时彻编纂方志时对材料的取舍。

① 《明世宗实录》卷426，嘉靖三十四年九月甲辰，第7373页。

② 参见张时彻：《芝园定集》卷46《祭阵亡指挥朱襄蒋升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集部，第82册，第333页。

③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2《吏部·二胡暴贵不终》，“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4册，第634页。

④ 如《赠总督默林胡公晋右都御史叙》《赠督府默林胡公进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叙》《再赠总督梅林胡公进秩叙》。参见张时彻：《芝园定集》卷31《序》，第167、174、175页。

⑤ 参见王明辉：《徐渭与胡宗宪》，《文史知识》2003年第1期。

⑥ 参见张时彻：《芝园定集》卷31《序·赠右都御史总督默林胡公平夷叙》，第173页。

⑦ 参见张时彻：《芝园定集》卷39《平夷碑》，第250—251页。

⑧ 张时彻：《芝园定集》卷31《序·赠卢都督叙》，第175页。

⑨ 张时彻：《芝园定集》卷31《序·赠虚江俞君擢南畿副总兵叙》，第166页。

⑩ 参见张时彻：《芝园定集》卷31《序》，第170、166页；卷22《书启》，第87页。

⑪ 张时彻：《芝园定集》卷7《五言古体·送田叔禾》，第765页。

⑫ 雍正《宁波府志》卷26《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30册，第855页。

二 嘉靖《定海县志》与嘉靖《宁波府志》的关系

嘉靖三十九年(1560),嘉靖《宁波府志》在知府周希哲的倡修下,由张时彻负责编纂。这部府志被时人奉为圭臬,浙江按察副使范惟一云:“今观于宁志,其烂然具载籍中,可按而睹者,大都皆所为修内治之具也。”^① 宁波知府雷金科亦云:“司马公前所为府志而观之,陈民风而昭上俗,如指诸掌而睹也。”^② 定海县作为宁波府的属县,嘉靖《宁波府志》自然会有大量关于定海的内容。作为一部优秀的府志,它记载的关于定海县的资料应该是最真实的。重修定海志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特别是邀请原作者来重修就更加困难了。所以,当定海知县何愈打算请张时彻来编修《定海县志》时,张也犹豫不决。“爰谋诸文学乐亮山辈,曰:‘志之为用大矣,乃旧志姑置之。即郡志非专于定者也,敢再檄宠于公,于诸君何如?’”^③ 海道副使刘应箕认为何愈的建议可行,“志都会者略,夫省志省者略,夫郡志郡者略,夫邑体裁有所重,其事故有详略,势也。兹专志邑,其事顾悉于郡志之所述也”^④。在经过讨论后,何愈依然决定延请张时彻修志。

果不其然,当何愈征询张时彻的意见时,张时彻就以自己刚修了郡志婉拒何愈的请求,“予尝志郡矣,复何言”^⑤。张时彻的担心不无道理,他在编纂嘉靖《宁波府志》时,“殚精绎思、正讹彰信”^⑥。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编纂新的定海志,是沿袭、更正还是补充都是棘手的选择,特别要想在自己不久前才编纂的旧志基础上再有所提高更非易事。但何愈早有准备,他以体例有别说服了张时彻,“体有专不专,事有核不核,非窃言之谒也”。在何愈的坚持下,张时彻“弗辞,而矢词撰意以应何令者也”^⑦,“乃进诸生,授以损益之旨而辑之”^⑧。

那么,嘉靖《定海县志》与嘉靖《宁波府志》关系究竟如何?两部志书的密切关系从编纂人员的组成上就可以窥见一斑。嘉靖《定海县志》的编纂人员中,除了主纂张时彻和负责订正的知县何愈,还有教谕吴经,训导毛九思、王颐,县丞万子复,主簿张卞符,典史马□以及生员李贤、卢叔麟、洪谟、乐亮山、江汝楠、谢谏、薛一乾等人,^⑨ 其中张时彻、卢叔麟、李贤、洪谟都曾参与嘉靖《宁波府志》的编纂。编纂人员的略同,也预示着两部志书会存在较大的相似之处。

从目录来看,嘉靖《定海县志》和嘉靖《宁波府志》非常相似,前者明显沿袭后者。首先,两部方志的大类目相似。它们都有疆域志、经制志、物土志、杂志4个大类目。略有不同的是嘉靖《宁波府志》是《传》,嘉靖《定海县志》是《列传》,仅仅是名称上小有差异。再就是嘉靖《宁波府志》有《书》这部分,而嘉靖《定海县志》无。其次,两部志书大类目下属的小类目相似。最明显的是《经制志》和《物土志》,两部志书的小类目完全相同。其他的类目差异也很

① 嘉靖《宁波府志》卷首《宁波府志序》,嘉靖三十九年刊本,日本早稻田大学藏。

② 嘉靖《定海县志》卷首《定海县志序》,第2页。

③ 嘉靖《定海县志》卷首《重修定海县志后序》,第14页。

④ 嘉靖《定海县志》卷首《修定海志叙》,第12页。

⑤ 嘉靖《定海县志》卷首《重修定海县志后序》,第14页。

⑥ 嘉靖《宁波府志》卷首《重修宁波府志序》。

⑦ 嘉靖《定海县志》卷首《修定海志叙》,第12页。

⑧ 嘉靖《定海县志》卷首《重修定海县志后序》,第15页。

⑨ 在明代,由地方官员主导,乡绅和生员积极参加的修志活动非常普遍。参见杨军仕:《明代地方官员与方志编修》,《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3期。

小，如《疆域志》部分，嘉靖《宁波府志》比嘉靖《定海县志》只是少了《河渠》。《杂志》部分，嘉靖《宁波府志》比嘉靖《定海县志》只是多了《艺文》。总体而言，嘉靖《定海县志》的目录基本沿袭了嘉靖《宁波府志》，具体见下表。

嘉靖《定海县志》和嘉靖《宁波府志》的目录异同表

类目	嘉靖《定海县志》	嘉靖《宁波府志》
	卷 1：輿地图、海图说；卷 2：沿革；卷 3：秩官；卷 4：选举	卷 1：輿地图、沿革；卷 2：秩官；卷 3：选举
疆域志	卷 5：分野、形胜、风俗、山川、河渠	卷 4：分野、形胜、风俗；卷 5：山川上；卷 6：山川下
经制志	卷 6：官制、学校、公署、城隍；卷 7：兵卫、海防、邮舍、都鄙、秩祀	卷 7：官制、学校；卷 8：公署、兵卫；卷 9：城隍、邮舍、都鄙；卷 10：秩祀
物土志	卷 8：土壤、户口、物产、贡赋、徭役	卷 11：土壤、户口；卷 12：物产、贡赋；卷 13：徭役
杂志	卷 9：机祥、坛庙；卷 10：第宅、冢墓、寺观、古迹、遗事	卷 14：机祥；卷 15：坛庙；卷 16：第宅；卷 17：冢墓；卷 18：寺观；卷 19：古迹；卷 20：遗事；卷 21：艺文
列传（传）	卷 11：名宦；卷 12：人物；卷 13：烈女、流寓、仙释	卷 25：名宦；卷 26—38：人物传；卷 39：流寓；卷 40：烈女；卷 41：艺文；卷 42：仙释
书		卷 22—24：海防、河渠、兵政

从具体内容来看，嘉靖《定海县志》对嘉靖《宁波府志》沿袭得更多。最明显的是嘉靖《定海县志》的人物传记，很多传记都是直接抄录自嘉靖《宁波府志》，如卢万、吉雅谟丁、汪汝懋、何公肃、陆本、许伯元、贺懋、宋宣、李廷仪、钱如京、陈轼、陈纯、田维、徐愿、孙枝、范文中、王恺、乐仁规、余天锡、沈焕、叶士、乐大原、曹粹中、刘洪、陶椿卿、黄玠、叶孟传、刘德名、陈端礼等人的传记几乎都是原文照录。类似的情况还有《疆域志》里的《风俗》《山川》，《城隍》里面的《寺》《舟山城》，《兵卫》里卫所的相关军事数据，嘉靖《定海县志》几乎是全文抄录嘉靖《宁波府志》。这表明张时彻在编纂嘉靖《定海县志》时较大幅度地使用了嘉靖《宁波府志》已有材料或结论。

事实上，嘉靖《定海县志》对嘉靖《宁波府志》也不尽是沿袭，张时彻也对一些地方进行了重写和增补。重写主要集中在地理沿革方面，相较嘉靖《宁波府志》，嘉靖《定海县志》的《輿地图》《分野》《形胜》等部分基本上都是重写。^① 增补的内容则大都与人物、事件有关。嘉

① 参见嘉靖《定海县志》卷 5《疆域志》，第 27—28、106—114 页。

靖《定海县志》的《秩官表》增加了大理寺丞王穆和著作佐郎王曙;^①《城隍》增加了谭纶祠、沈恺祠;^②《冢墓》增加了谢宗墓、清敏公丰稷墓;^③《寺观》增加了道隆观;^④《祀祥》增加了嘉靖三十九年以后的事情;^⑤增补最多的是人物传记,唐叔翰、施廷臣、赵大忠、曹一和等人在嘉靖《宁波府志》中无传,但在嘉靖《定海县志》中皆有立传。这些改动表明张时彻在编纂嘉靖《定海县志》时,并非盲目地抄录嘉靖《宁波府志》,而是在嘉靖《宁波府志》基础上作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嘉靖《宁波府志》的编纂,“始于嘉靖乙未九月十有六日,迄事于丙申五月六日”^⑥,用时约9个月。而嘉靖《定海县志》的编纂“凡阅五月而告成”^⑦,用时5个月。张时彻编纂嘉靖《定海县志》仅仅比嘉靖《宁波府志》少用4个月的时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张时彻编志的艰辛以及其严谨。正是因为张时彻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使得嘉靖《定海县志》的光芒并未被嘉靖《宁波府志》所掩盖,反倒因为它对定海地区的情况把握得更全面、详细、准确而受到时人的赞誉。“后有作者,其弗可及也”^⑧,评价甚高。

三 嘉靖《定海县志》的价值

嘉靖《定海县志》作为定海地区在明代仅有的3部方志之一,它的价值不言而喻。张时彻在嘉靖《宁波府志》的基础上不仅使用了许多新的材料,也更正了一些讹误,这些努力使得嘉靖《定海县志》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

一是一些时人所作的文献赖以存世。田汝成(1503—1567),嘉靖五年(1526)进士,浙江钱塘人。历官南京刑部主事、滁州知州、广西右参议、福建提学副使等职。他的文集《田叔禾小集》只收录了嘉靖四十年以前的作品,并未收录他的《卢镗战功记》,幸赖嘉靖《定海县志》才得以传世。翁大立的《卢镗生祠记》和丰道生的《俞大猷生祠记》同样如此。翁大立(1517—1597),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浙江余姚人。历任应天巡抚、河道总督、山东左布政使、南京兵部尚书等职,著有《咏史编》《国朝文献》《督抚江西奏议》。丰道生(1522—1566),浙江鄞县人,历官吏部主事、通州同知等职,著有《易辨》《古书世学》《春秋世学》和《书诀》。两人皆未见有文集传世,《卢镗生祠记》和《俞大猷生祠记》是他们唯一存世的文学作品,非常难得。再如王交的《龙门牌坊记》和何愈的《科甲记》。王交(生卒年不详),嘉靖二十年进士,曾任刑部给事中。何愈(生卒年不详),时任定海知县。两人皆无专著传世,这两篇仅存于世的作品就显得特别珍贵。嘉靖《定海县志》保存的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相关人物的文学才能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也为我们以后辑佚、校勘提供了可能。

二是相关记载可以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王直是嘉靖时期最著名的倭寇头目,剿灭他是胡宗宪生平最大的战功。《擒获王直》作为记载胡宗宪消灭王直之役的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文献,作者为了达到突出胡宗宪形象的艺术效果,极力淡化卢镗发挥的直接作用:“公(胡宗宪)

① 参见嘉靖《定海县志》卷3《秩官》,第57页。

② 参见嘉靖《定海县志》卷6《城隍》,第221、224页。

③ 参见嘉靖《定海县志》卷10《冢墓》,第401页。

④ 参见嘉靖《定海县志》卷10《寺观》,第407页。

⑤ 参见嘉靖《定海县志》卷9《祀祥》,第370、371页。

⑥ 嘉靖《宁波府志》卷首《宁波府志叙》。

⑦ 嘉靖《定海县志》卷首《重修定海县志后序》,第15页。

⑧ 嘉靖《定海县志》卷首《重修定海县志后序》,第16页。

当直未至时，已度其有隙，欲调俞大猷于金山，而以总兵卢镗代之。卢镗者，旧与王激等从事舟山，同饮食，抚循倭人备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群倭砺兵刃，伐竹木，为开市计。”^①不仅如此，还处处突出在胡宗宪主导下的说降行动，“乃以夏正等为死间谕王直”“又使生员方大忠往来说游”。据此，卢镗似乎扮演着可有可无的作用。然而，据嘉靖《定海县志》收录的《卢镗战功记》，我们可以发现总兵卢镗实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冬十二月，贼首王直挟倭千余突入舟山岑港要求互市，上下危疑，公奉总督都御史默林胡公密檄过浙，直抵贼所，谕以祸福，誓以兵威，直遂就擒，解送军门，奏请梟示，公以前功升二级。”^②从二品的高官卢镗亲自出马成功劝降王直，显然比官阶较低的夏正劝服王直更符合常理。卢镗的行动可以从嘉靖《定海县志》收录的《卢镗生祠记》得到印证，“岁丁巳，叛酋王直引倭奴千余突入岑港求互市，远近汹汹，总督默林胡公檄公问计，公乃亲诣贼所，谬为推诚”^③。

三是更正了人物传记的讹误。如黄震，嘉靖《宁波府志》记载他是慈溪人，张时彻经过实地调查认为他是定海人。“旧史俱称慈人，以乡贤祀于学宫。因定海灵绪乡之古窑有黄文洁故宅，读书卧床桥在焉。其子孙世居于此，而大蓬山麓有湖山书院。后又徙于泽山，皆定境也。以故定亦祀之学宫。盖大蓬山界在两县，山南为慈境，山北为定境。震生其间，筑室藏修，其人品伟卓。故两县皆崇祀之，犹大蓬山于两县志亦互存也。”^④如许伯原，嘉靖《宁波府志》记载他在永乐年间是定海的知县，^⑤嘉靖《定海县志》则改为“洪武间授定海丞”^⑥。由于许伯原曾在洪武初年修海石塘上的永赖亭，“洪武五年，邑丞许伯原即旧亭故址重建永赖亭”^⑦。据此，许伯原在洪武初年做官的可能性要大于永乐时期。再如陈表，嘉靖《宁波府志》将他系于定海人，“昌国百户。嘉靖癸丑倭寇入城，表曰：‘吾力无如之，何有死而已，但所摄印多，我死置印何地耶？’遂送母出城，纳印于千户金釜，出门追贼，奋□而死”^⑧。但昌国卫在象山，不在定海。所以，张时彻在嘉靖《定海县志》中删掉陈表传的做法是正确的。这些改动为后来的雍正《宁波府志》、光绪《镇海县志》所采用，避免了以讹传讹。

结 语

嘉靖中后期的倭乱，给浙江地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志书为我们了解当时地方社会的风貌以及时人的思想、情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不管是胡宗宪在嘉靖四十年主修的嘉靖《浙江通志》，还是王叔果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编纂的《永嘉县志》，亦或周粟主修的稀见卫所志嘉靖《观海卫志》，都记载了大量与倭寇相关的内容，都表露出对倭寇痛恨的情感，这是这一时期方志最鲜明的特点。张时彻主纂的嘉靖《宁波府志》如此，嘉靖《定海县志》更是如此。张时彻在方志中的情感倾向除了与他的家国情怀有关，他个人的独特经历以及人际关系同样也深深影响着嘉靖《定海县志》的编纂。

① 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9《擒获王直》，第622页。

② 嘉靖《定海县志》卷9《坛庙》，第389页。

③ 嘉靖《定海县志》卷9《坛庙》，第384—385页。

④ 嘉靖《定海县志》卷12《人物》，第528页。

⑤ 参见嘉靖《宁波府志》卷32《传八》，第1008页。

⑥ 嘉靖《定海县志》卷11《名宦》，第453页。

⑦ 雍正《浙江通志》卷63《海塘》，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2册，第573—574页。

⑧ 嘉靖《宁波府志》卷32《传八》，第1304页。

由于定海是宁波府的属县，且嘉靖《宁波府志》修完才不过3年，所以嘉靖《定海县志》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抄袭嘉靖《宁波府志》，特别是在主纂者是同一人的情况下更易如此。通过比较两部方志，我们发现嘉靖《定海县志》在目录和具体内容上都或多或少承继了嘉靖《宁波府志》。但是，从两部方志的诸多差异之处我们也可窥见张时彻为编纂一部高质量志书作出的努力。

正是在张时彻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下，嘉靖《定海县志》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它收录的卢镗、俞大猷等人的传记不见于时人田汝成、翁大立、丰道生等人的文集，幸赖嘉靖《定海县志》才得以存世。特别是它收录的《卢镗战功记》一文，可以刷新我们对于卢镗在剿灭王直之役中所发挥作用的认知。总之，张时彻编纂的嘉靖《定海县志》不仅体现了他本人出众的志书编纂能力，也反映了明代浙江地区方志编纂技术的成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责编：詹利萍

明代嘉靖《辉县志》的一则误记

张建辉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61卷含嘉靖《辉县志》，其中第223—224页记有教谕赵智、训导金鱼、训导褚宁的诗，其中褚宁的诗被记作：“涌金亭上风光好，乘兴而来景更幽。杨柳阴中朱鸟集，菰蒲深处锦鳞游。万珠迸出须臾没，百脉同来日夜流。秋意萧骚村酿美，浅斟细看打鱼舟。”其实赵智、金鱼、褚宁3人的诗是唱和之作，褚宁的诗与其他两人明显不同，而且刻有3人唱和之作的原石尚存。该石现存于河南省辉县市百泉涌金亭内部南壁左侧，镶于墙中，位于上下排列的5块石碑的中间，即第3块，保存完整。石碑高82cm，宽38cm，碑文为：“予典教辉庠，辛卯五月朔日之暇，偕同寅二君子游览卫源，因为一律求和，并勒于石，以纪一时之兴耳。盘桓亭下日将西，万斛珠玑望眼迷。白鹭回翔芳岸远，清波倒浸楚天低。公和嘯岭云为幕，康节吟窝石作梯。得暇与君重过此，拂尘分和壁间题。金陵赵智。乘闲策马出城西，烟树苍茫路欲迷。水面珠玑光错落，波中鸥鹭影高低。东回莲渚还堪赏，西望山峰不可梯。自是冷官多逸兴，涌金亭下各留题。富阳金鱼。泉源来自太行西，散乱金珠入望迷，小蟹纵横苔石动，倏鱼跳跃水苏低。清高恍入云霄路，潇洒如登月窟梯。乘兴解鞍徐步处，满怀乐趣把诗题。太原褚宁。成化七年是月望日立。”可见，褚宁的诗当以百泉涌金亭内的石刻为准，明代嘉靖《辉县志》中褚宁的诗或系误记。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